

第一章 高等教育 的新际遇

一种名之为新事物的是新者的普遍性，变者之为变的是变者的规模与范围，因之，世界随我们之运动而改变，所以，衡量人生岁月不当是一些小的进步或改善或孩童时期所学之运筹，而应当是一个巨大的提升。……指责过去使我们漂泊不定的变革是徒劳的，而且在我的深层意识中我以为这是病态的。我们需要认清这种变革，了解我们所拥有的资源。

—— 罗伯特·奥本海默

地狱乃迟到之真理。

—— G. W. F. 黑格尔

我告诉过你我有病。

—— 墓志铭，康涅狄格州

衰落和破产的幽灵笼罩着高等教育。专家预言，到 1995 年，美国 3 100 所学院和大学中的 10%~30% 将会关门或与其他机构合并。在许多学校，人们对即将签署的协议或转让的担心几乎随处可见。

在过去的几年里，一批教授，包括数百位终身职教授相继被解职。这无疑是令人关注的。为此，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于 1982 年 5 月在华盛顿特区举办了一个为期 3 天的研讨会，审查了有关解职、终身制以及教授的权利与义务的主张。一时间，关于高等教育紧缩开支、衰落、重组的专著和文章铺天盖地。^[1]这一时期，每一次大学校长会议都充塞着人们关于学校财务困难、注册学生减少以及学校生存问题的讨论。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小规模私立学院、学术水平较低的学院和社区学院所受冲击是最严重的，但实际上，各种规模的学院和大学，不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潜藏着深深的危机。成百的学院和一些大学已经接近破产的边沿。威斯康星州的密尔顿学院就是一个例子。

密尔顿学院由浸礼会的开创者们创办于 1844 年，其注册学生数从 1970 年的 800 人减少到 1981~1982 学年的 210 人。学院 14 幢建筑中的 4 幢已于 1982 年封闭了，其中包括拥有 600 个座位的剧院，因为这些建筑的维修更新需要 25 万美元，而学院拿不出这笔钱。学院所欠供货商和抵押借贷者的资金达 370 万美元。学院的捐赠基金一向不多，现在所获捐赠基金的本金只有 10 万美元。24 名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的工资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40%，一年仅为 1.85 万美元，有时候还要拖欠 3 周才能发放。学院年鉴自 1974 年以来就没有再出版过，学院通讯自 1978 年 11 月就中断了出版。1981~1982 学年密尔顿学院的学费为每生 5 800 美元，该院的许多学生都是依靠联邦助学金和贷学金支付一半的学费、住宿费和伙食费。然而，联邦政府正在削减其高额的学生资助。学

院 190 万美元的年度运行预算中的 4/5 来自学费、住宿和伙食费收入。校友和其他捐赠者赠与的现金往往被用于偿还学院拖欠的债务或者支付教职工的薪水。^[2]显然,这所学校处于危险之中,事实上该校已于 1982 年 5 月作出决定 关闭其主校区 只维持几个校外教育计划。

密尔顿学院并非特例。1979 年联邦教育署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开始接手管理联邦政府购房与市镇开发部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ing) 的大学贷学金事务。该机构贷学金管理处的报告指出,1982 年有 177 笔贷学金遭到恶意拖欠或未履行契约,资金总额达 2 280 万美元。这些拖欠的贷学金大多数贷给了小规模私立学院的学生,一部分学生自 1974 年以来再没有偿还过联邦贷学金。也许 1/10 的美国学院和大学目前与波兰经济的处境是相同的。

大规模的大学,包括美国许多最知名的大学也没有远离危机,虽然它们的储备明显地要丰厚一些。纽约大学和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直到最近分别从纽约市和丹佛斯基金会收到大宗的外部支持后才缓解了所面临的严重困难。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布朗大学和图勒因大学 Tulane 因松懈的财务和学术管理在 20 世纪 70 年代都出现了大量的赤字。哥伦比亚大学不得不从其捐赠基金中借支 5 000 万美元。布朗大学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已经用掉了 1972 年捐赠基金的 1/3 约 1.2 亿美元。(两校在最近几年都采用了新的财务手段,引进了现代财务管理,现在财务上都恢复了黑字运行。)斯坦福大学在财政预测与规划方面是一个先行者,由此避免了每年数百万美元财务赤字可能给学校带来的威胁。这是该校两位规划人员坦诚公布的事实。^[3]1981~1982 学年西北大学财务状况恶化,赤字接近 800 万美元。在安亚伯的密歇根大学,董事会从学校 1981~1982 年度预算中削减了 1 160 万美元,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大学面临着被迫裁

减总数达 600 名教职员工的形势，裁员的方式有短期解聘、中止续聘和退休等。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专业研究生院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在 1976~1983 年间，两校的专业研究生院的注册学生都减少了近 1/3。普林斯顿大学为了避免每年 1 000 万美元的财务赤字，在经济衰落期间，发起了一个 2.75 亿美元的募款运动。

美国高等教育的处境不如人们所公认的那样令人关注，但它存在的问题却比人们所普遍意识到的要严重。

之所以不那么令人关注是因为学院和大学经常不得不千方百计去募集必需的资金。美国的学院和大学是世界上一个独特的高等教育系统。没有哪一个国家人均拥有如此众多的学院，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这样大规模的私人举办的院校系统（尽管日本和一些西欧国家拥有一些非国立大学），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大学像美国一样，拥有让独立董事制定学校政策和监管学校事务的传统。

美国学院和大学在社会上处于一种特殊的、危险的境地，居于竞争性的营利商业部门和由政府所有与运作的国家机构之间。它们具有依赖性，却是自由的；它们是市场导向的，却不受文化与学术风气的影响。教师是发明家、企业家、知识的传播者和美学家，感性但却如牧师或医生一样又是专业人员。学校不缴税，却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它们履行自身使命的方式很像其欧洲同行在文艺复兴时期所做的那样，依然是高傲和迂腐的、正如拉伯雷眼里的那些先行者；但现代企业却愿意为它们买单，资助它们开拓未来。它们构成了全国最大的产业之一，但又是所有组织中最不像企业、管理最不良的。不论怎样，它们都像荒凉山水之中的大型动物，永不停歇地搜寻着维持生命所不可或缺的财政补给。

早期，殖民地学院游说发行州彩票以支持办学，在宗教集会上募集资金，在成功的商人或虔诚的、富裕的农场主中间广交慷慨的朋友。¹⁹ 世纪前期和中期，学院依靠城市议会的议员和拥戴者、州政府——在南方尤其如此——房地产开发商以及雄心勃勃的宗

教派系为其买单。就像高傲但瘦削的乞丐，学院常常装出比它们自认为的更加宗教化，把自己装扮得很贫穷，提供廉价的服务，如同走街串巷的小贩。^[4]哈佛大学 1853 届毕业班，包括后来成为哈佛著名校长的查尔斯·埃利奥特在内，只有 89 名学生，全校不到 400 名学生。^[5]1860 年，耶鲁大学学生每年的学费只有 39 美元。

然而，美国高等教育的理念大多形成于 19 世纪。本地主义的模式、许多相互竞争的学院以及来自私人 and 公共的资助，也都形成于 19 世纪。正如教育史学家大卫·珀茨所发现的，多数 19 世纪的学院从宗教派系所获资助比有些人所想像的要少：“学院创办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学院创办人和一个特定的镇或县的联合。从根本上说，这种联合常常是通过创办人赞同将学院落户于一个特定的社区，以换取从社区所募集的一定数量的经费。”^[6]直到今天，许多学院仍然以其所处社区命名，如沃汀 (Albion)、戴维森 (Davidson)、丹佛 (Denver)、盖茨伯格 (Gettysburg)、瑞邦 (Ripon)、柔诺克 (Roanoke)、斯沃特莫尔 (Swartmore)、维提尔 (Whittier) 等等。

这一时期，少有校长是学者出身，通常是法官、商人、编辑、前州长或前参议员、牧师。他们学习商界的策略和教会的策略，用于支撑学院财政。在向商界学习方面，他们采用推销员的方法。多数学校都有一位“学院代理人”，这是一个募款者和招生官员的角色，其职责就是在学院所在地区四处出击，向公民中的领袖人物和一般公众谋求资助并为教授招揽学生。他们向潜在的资助者所传达的信息包括：学院将培养牧师、律师和教师；将为当地工商企业培养聪明的、善经营的年轻人；将提高当地的土地价值；将是房地产、食品和书籍的购买者，当地服务的消费者；还将为当地带来文化、文明、讲座和音乐。他们向潜在的学生所传达的信息包括：大学教育是通向个人财富、权力和权势的关键一步；精神修养于一个迅速变化的、走向民主化的社会是有益的；而且大学教育能为人打开一个超越个人家庭、宗教、市镇和父辈职业的、鼓舞人心的新世

界。⁷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学院和新兴大学突然发现了三个获得财政资助的新渠道，这些渠道促使它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是定期向自己的毕业生募款，这是它们向教会学来的。这有点像航空公司请以往的乘客每年给予资助，以确保航空公司的强大，因为公司曾经搭载乘客到上千英里以外去探望即将去世的祖母，而且乘客的孩子某一天也会需要优质的航空服务。这方面的募款仍然是美国高等教育所独有的，而在其他国家是少见的。成立校友会最早的，是位于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威廉学院，成立于1821年。鲍朵寅(Bowdoin)和哥伦比亚的校友会成立于1825年，普林斯顿校友会成立于1826年，俄亥俄的迈阿密和拉格斯(Rutgers)的校友会成立于1832年，佐治亚大学校友会成立于1834年。⁸

第二个新的资助渠道是州政府。尽管很多州在19世纪早期就创办了州立大学(佐治亚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建校于这一时期)多数公立学院和大学直到1862年《莫雷尔赠地法案》颁布都极少受到政府的重视或获得政府的拨款。尔后，在国内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多数州都开始为州立大学和师范学校、师范学院拨款，这些院校为公共学校教育的大发展培养师资。^[9]不过，也有一些州，尤其是宾州和马里兰州，更倾向于用政府的高等教育拨款资助现有的私立学院。到20世纪20年代，东北部以外的多数州都将1/10强的年度政府预算用于资助本州的学院和大学。

第三，美国工业的兴旺发达造就了成百上千新贵家庭。啤酒酿制商如马太·瓦萨，铁路投资商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和莱兰德·斯坦福，石油大王如约翰·D·洛克菲勒，还有肉制品商、金融家、糖商、房地产商、钢铁大王以及其他富裕起来的人逐步认识到高等教育事业是一项值得追求的事业，他们庞大的财富中包含对高等教育的贡献。一些工业巨擘创办了独立的学院和大学，如

康乃尔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继之而来的是这些大企业家成就了一大批学术管理领袖，他们中的一些人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丹尼尔·科特·吉尔曼、哈佛大学的查尔斯·埃利奥特、密歇根大学的詹姆斯·安吉尔、斯坦福大学的大卫·S·乔丹、康乃尔大学的安德鲁·怀特、威斯康星大学的查尔斯·V·亥斯，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也如那些工业“帝国”的缔造者一样，果敢无畏。他们中尤为人称道的是威廉·R·哈珀，他创办芝加哥大学的方式一如安德鲁·卡内基创办美国钢铁公司。“当大学拥有5 000万美元的时候，就要采取第一步行动了。”哈珀校长如是说，显示了他远大的办学抱负。而这正是他从学校一位董事约翰·D·洛克菲勒那里所吸取的经验。^[10]

为此，高等学校不得不在其董事会中为这些新的施惠者安排位置。校友们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董事会中获得席位，而商界人士也在这一时期逐步取代牧师而成为大多数学校董事会的成员。对于州立大学来讲，它们必须为保证学校不受到民选政治领袖的控制或统治而不断抗争。

美国高等院校的历史就是一部没有止境的斗争史。学校一方面要满足和迎合当地潜在的或实际的捐助人，就像现代的梅迪西斯医药公司（Medicis），他们能够资助学校不同寻常的文化和智力劳动，另一方面又要保证主要的追求和自由避免受到来自经常是强有力的，且往往是十分热心的固执的捐助人的影响。美国高校的校长和校董会历来所扮演的都是一种永不妥协的如同绷紧的绳索的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发现了另外三大施惠者：大慈善基金会、作为企业法人或实体的商行和联邦政府，它们将数以百亿计的美元投入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研究与新设施，还资助贫穷学生和黑人学生，使他们也能入学接受高等教育。私立院校接受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更多的资助。公立院校来自校友、商界、基

金会和社会新贵的捐助不断增加。

时至今日,资助高等教育的所有这些历史渠道仍然在发挥作用,甚至还有州彩票,以补充学生及其家长所缴纳的学费之不足。

(学费约占本科生教育支出的 60%和研究生教育费用的 30%)看来,这一精密织就的施惠者“缎锦”应当不仅可以保障学校免受任一渠道的主宰和控制,而且应足以能维持学院和大学适当的需要。

这些渠道直到最近都是有效的。事实上,从 1955 年到 1974 年的 20 年是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最富裕的时期。这一时期先后担任劳伦斯学院和哈佛大学校长的纳善·普希最近写道:“如果一个人再回过头去公正地审视这些年学院和大学里所发生的事情,这一时期不可能被认为是最受漠视或被遗忘的时期,相反,却是一个令人记忆愉快和感激不尽的时期,甚至也许可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期。”他接着把这一时期称为“美国高等教育最幸运的时期”和“美国科学的黄金时期”。^[1]

这一“黄金时期”的统计数据是令人惊奇的。

根据联邦统计,学生数从 1955 年的 250 万人增加到 1974 年的 880 万,20 年时间里增长了 3 倍多。这一时期要求接受大学教育的年轻人的数量增加了,高等教育吸纳了 1944~1958 年间人口出生高峰期所出生的许多年轻人。高等教育中 18~24 岁年龄段学生注册攻读学位人数的比例由 1955 年的 17.8% 上升到 1974 年的 33.5%。黑人大学生的数量由 1955 年的 9.5 万(估计数字)人猛增到 1974 年的 81.4 万人,涨幅达 8 倍。20 世纪 50 年代还少有外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到 1974 年留学生人数达到 15.2 万人。女大学生人数的比例因追求普遍平等,从只占 1/3 增长到占 1/2。

为了适应学生人数激增的需要,美国高等教育的物资设施增加了一倍。在这 20 年里所修建的校舍比先前 200 年所修建的还要多。州立师范学院升格为文理学院,私立两年制学院发展成为

四年制高校，规模不大的专门化的州立大学成为了大型的综合性大学。优秀的私立大学增设了新的研究生教育专业，科学研究的规模增加了三倍。知名的州立大学要么在本地区创办小型分校，要么眼睁睁地看着大规模的新的竞争对手出现于本州的其他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全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形成了，这就是地方资助的两年制社区学院。1955年全国只有约400所小规模社区学院，通常是职业导向性的，注册学生32.5万人，校均约800名学生。到1974年，发展到全国有973所两年制学院，注册学生达到340万人，平均每校约3700人。在这20年里，通过每两周建立一所新的两年制社区学院，美国高等教育创造了一种新的学院教育形式。这些学院所注册的学生几乎占到全部高等教育的40%，这至今仍是美国高等教育所独有的。新社区学院大大减轻了老的四年制学院和大学所面临的不断增长的职业主义和工作培训的压力，减轻了它们招收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的压力，减轻了它们来自贫穷的和少数民族家庭子女所需要的大规模资助的压力，减轻了它们开展新型在职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压力。

美国高等学校教师则从1955年的26.6万人增加到1974年的63.3万人。为了能够培养更多的教授，文理研究生教育专业迅速发展。到1974年，850多所高校开展了研究生教育。每年授予的文学硕士和理学硕士学位从1955年的5.8万人增加到1974年的27.8万人，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则从1955年的8800人增加到1974年的3.3万人。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是有其代价的。几项近期的研究表明，所有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或其他博士学位的现任教师中有3/4的人在他们的整个学术生涯期间没有在受人尊敬的学报或一流杂志上发表一篇以上经过同行评审的文章。换句话说，就是用传统的眼光来看，超过50万的现任教师中只有1/4的人能够被称作是具有创造性的学者。

但就是这1/4的教师，到1974年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

的教师。根据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1955 年全美高校的研究与开发经费为 3.12 亿美元。到 1974 年这个数字窜升到 30 亿美元，20 年里增长了近 10 倍。在 1950~1981 年间，美国教授赢得了大多数的诺贝尔奖（176 项中的 93 项）。美国现在是思想界的领袖。在高等学校的研究中，1955 年联邦政府资助的占 54%，到 1974 年达到 66%。在 1955~1964 年的 10 年间，仅基金会的资助就增长了 5 倍，校友和商业企业的资助也成倍增长。^[12]

毫不奇怪，这一时期也是教师收入的黄金时期。传统上教师的工资比其他专业群体的工资要低，但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化后教师的收入状况是：在衰退时期下降得较少，在繁荣时期增长得也较少。例如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下滑时期，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于 1937 年所作的一项关于 125 所学院和大学的调查发现，1930~1936 年间 84% 的学校至少削减教师工资一次，其中包括 95% 的公立学校和 65% 的私立学校，但教师工资的购买力仍然比 1929~1930 年高出 10%。尽管战后经济不断增长，但是，1952 年之前教师工资一直增长缓慢。不过，此后受供求因素和人力方面新的公共利益的影响，教师津贴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速度，也比其他所有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得要快。1952~1970 年间，教授的收入比其他许多专业群体的收入都有更快的增长；其他群体中，只有医生、律师、工程师、地方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的收入的增长较快一些。而且到 1974 年，当增长开始明显地放缓的时候，教师的工资的增长还是快于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使教师工资的购买力大增。另外，教师和学校员工的福利，以往就比较好，现在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而且来自外部活动的收入如咨询费、稿费、演讲费以及暑期工作收入等都有了很大的增加。爱沃瑞特·莱德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到 1977 年全部教师中 83% 的人有外部收入，平均数量达到他们的基础工资的 15%。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富有创造性的正教授的收入能够与商业主管相媲美，

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当然，那些身居企业最高层的管理人员和金融领袖除外。^[13]

然而，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战后高等教育不同寻常的增长开始减缓。到 1980 年，很明显，一个艰难的衰退时期又要到来了。1968~1972 年间，学生游行、不时发生的校园暴力与破坏活动以及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在捍卫学术自由和秩序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和迟钝，使公众对高等教育再次失去了尊重和信心。正如威廉·杰雷马、伊尔·切特以及其他人所揭示的，尽管在 20 年里高等教育财政资助获得了空前的增长，但是，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许多学院和大学的财政状况与“黄金时期”开始前的糟糕形势差不多。

现任伯克利加州大学商学院院长的切特 1971 年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私立学院和大学中有 1/4 的学校现在正动用捐赠基金弥补运行开支。”他补充说：“学校经常性收入的紧张状况是严重的。”^[14]即使在 1968~1969 学年，全国私立学院和大学负债额超过其有形资产价值的 26%，总数将近 30 亿美元。学生数少于 500 人的所有私立学院中，有近 20% 的学校每年的赤字达到其经常性运行预算的 8% 或者更多，学生数在 500~1 000 人的学校中，有 16% 也是如此。^[15]

对很多大学来讲，突然之间就好像丧失了真正的管理，而且学校的财政是脆弱的。豪沃德·鲍温的描述似乎再准确不过了：“大学财政的基本原则是非常简单的。学校尽其所能募集资金，并将其全部花光。因此，生均支出主要取决于所能募集资金的数量；如果募集少了，支出就下降。”^[16]

另外，1973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卡特尔的出现以及随之而上升的石油价格，忽然导致燃料账单呈 3 倍或 4 倍地增长。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两位数的通胀致使学校图书馆藏书和期刊、教学与研究设施以及劳动的成本急剧增加。社会保险制度可能面

临的财政崩溃致使学校不得不承担起教职员工的社会保险。随着保健开支的上升，主要医疗保险费也提高了。新的残疾教育和实施“肯定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plans）的开支成为必需。由于教授终身制吃紧，针对大学的法律纠纷案件增加，大学法律工作人员的规模一般都扩大了3倍，相关支出显著增加。计算机革命要求购买昂贵的新硬件。更细微的联邦会计程序、州协调机构的出现，过多的数据要求，谋求更大公责的、敏感的州预算官员，导致学院和大学中院校研究、会计和报告人员不断扩充。财政已经主宰学校管理。

在所有这些变革中，最主要的是上大学的年轻人的数量上升到最高点后从1978年开始下降。1979~1994年间美国18岁人口的数量将减少1/4。在东北部和中西部的13个州，预计1979~1994年间高中毕业生的减少会是一个尤为严重的问题。

罗得岛	49%	宾夕法尼亚	39%	衣阿华	34%
康涅狄格	43%	密歇根	36%	俄亥俄	34%
马萨诸塞	43%	明尼苏达	35%	威斯康星	34%
纽约	43%	伊利诺斯	34%	印第安纳	30%
新泽西	39%				

美国42%的授予学位的学校和51%的私立四年制学院和大学都分布在这13个州。^[17]

在美国高等教育中，预计大学注册学生将急剧减少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历史上美国高等学校的注册学生数也曾经偶尔下降过，如1917~1918学年、经济衰退时期的1933~1934学年、1942~1944年以及1950~1952年。但这都是一些特殊的年份。自从美国内战以来，年轻人进学院和大学接受高级教育的人数是稳步增长的。高等教育还从来没有需要面对生源持续减少的形势。不仅如此，1961~1975年间人口出生率下降15%，这是美国

历史上出生率下降最严重的时期，这一下降比率是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衰退时期的人口出生率下降比率的两倍。^[18]

因此，从财政和人口两方面看，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形势是极为严峻的。

尽管如此，其他几种主要因素及其变迁对高等教育的这种革命性变革形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们都威胁到高等教育结构的转型。这一形势或多或少有如敏锐的、温和的、坦诚的克拉克·科尔和杰出的美国高等教育分析家大卫·瑞斯曼所指出的：“新方向的变革可能标示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是一个教育规划的时代。”^[19] 高等学校必须应对财政的削减和生源的减少，同时，其现行结构和专业教育计划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人们强烈要求学校进行彻底反省和改革。裁撤和重组是学院和大学所面临的两大压力。

那么，主要的因素及其变化是什么呢？

1. 变化的学生顾客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人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因素。而且美国高校面临着一个人口变革的时代。不只是到 1994 年 18 周岁年龄人口将比 1979 年减少 100 万，而且 18 岁年龄段人口的构成也将发生很大的变化。白人学生将逐渐减少，黑人学生将不断增加，因为自 1960 年以来白人的出生率比黑人下降了很多。还会出现一批西班牙裔学生，数量与黑人学生差不多。而且还会有更多的亚裔学生。我们这个“移民国家”已经不再主要由欧洲和非洲移民所构成。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如同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一样，移民都是十分踊跃的，美国也成为了拉美和亚洲移民的国度。下面是一组来自两个大陆的移民的数据，由此可以比较 20 世纪 50 年代和 70 年代合法移民的情况。^[20]

	1950~1959 年	1970~1979 年
古巴	79 000	251 000
厄瓜多尔	10 000	44 000
海地	4 000	50 000
韩国	6 000	236 000
越南	3 000	132 000
菲律宾	19 000	312 000
印度	2 000	143 000
中国香港	26 000	205 000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有 430 万合法移民和避难者以及 700 万 (估计数字)非法移民移居美国。1981 年有 1 500 万至 1 800 万西班牙裔美国人。据全国健康统计中心新近的一项研究,该族裔人口的出生率比全国其他人口高出 75%,该族裔已经成为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少数民族。在底特律,中小学校现在提供了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授课(底特律是除中东以外讲阿拉伯语的人口最多的城市)。

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民族极端多样化的国家。

在世界上最优秀的高校中,美国学院和大学对外国优秀学生也越来越富有吸引力。在过去的十余年时间里,在美国高校学习的外国青年学生的数量翻了一番,从 1970 年的 145 000 人增加到 1982 年的 321 000 人。美国教育理事会的官员预计,20 世纪 80 年代外国留学生的数量可能还要翻番。在有的学校,如南得克萨斯大学、南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超过 1/5 的全日制学生是外国人。

另外,毫无疑问,美国的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们正成为世界各国聪明的年轻人的求学之所,因为多数国家自己不能提供高质量的学士后和专业学院教育。美国高校中 1/12 的研究生是外国人。1980 年美国高校中所授予博士学位的学生

中 16% 为外国学生 其中 1/3 是工程学科的。

除了学生的种族、民族和国家背景外，第二个主要的变化是注册学生的年龄。在不久以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学院和大学学生的年龄都是在 17~24 岁之间。1979 年全国教育统计中心预计，有 36% 的学生的年龄在 25 岁以上。现在毫不奇怪的是，公司管理人员、工程师、军官以及中年妇女为了新的工作，来到校园中学习。教授和大学管理人员在另一所大学注册学习计算机科学、外科新技术或财务管理也不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情。而且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也来到学校注册学习课程。在马里兰大学的大学学院的成人教育部，20 世纪 70 年代 50 岁以上的学生的人数增长了 51%。而且，在大学中学习的中学生的数量也在增长，他们或者利用放学后的业余时间，或者在暑假期间，或者中学高年级的时候提前到大学学习。

学生年龄上的这一变化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高等教育所发生的最重要的转变之一。大学为此不得不极大地调整其角色，由传统的教导青年后期的大学生转变为教育青春期后各个年龄段的人们。这对于授课、安排教学、招生、规划教学计划的内容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一个越来越知识化的社会，学院和大学正在成为每一个社区的中心组织，对于警察、长于科学和数学的中学生、音乐家、教师、希望自己开公司的艺术家、准备去国外旅行的家庭来讲，学院和大学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三个主要变化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伟大时代的变革，另一方面是因为高等教育费用的升高。现在越来越少的学生在一所学校连续念完四年的大学，越来越少的学生是全日制的。越来越多的学生在社区学院读两年，然后进一所四年制学校，或者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大学，或者辍学一两年去工作和旅行，或者在两所学校里念研究生，而不是一所学校连续念完全部高等教育

课程。1980 年，美国高等教育的 1200 万注册学生中的 40% 是非全日制学生。尽管最好的大学尤其不欢迎非全日制学生，对待这些学生，有的几乎丝毫不近情理，但是，到 1990 年，将有超过一半的学生是业余学习的，包括一些最优秀的学生。

高校应当重新设计其提供教育服务的方式，正如有的已经开始做的那样，以适应其顾客的特性和入学方式上的上述三种主要变化。

2. 日益分化的大学课程

在过去数十年间，比较常见的美国高等教育的悲哀之一就是人文课程不断遭到削减。几位教育领导者一贯坚持大学教育要回归某种形式的、整合的、宽广与核心相结合的四年课程，并把它作为自己最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使大学生了解西方文化历史中灿烂的艺术和思想，最新的科学、数学及技术，非西方的、非白人的、非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人民及其价值观与语言，还有各种思维方式、信仰及我们这个时代的研究。他们要求给予学生一种共同的教育，要使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这是一个光荣的目标，也是一个沉重的要求。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们创建了现代人文课程，而且该大学仍然实行着全国本科教育中最强大的通识教育计划。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毕业生，我全身心地支持这一目的。正如耶兹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分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缺少整合的专业化是危险的。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能回避的新情况，正如 16 年前丹尼尔·贝尔在他的权威的研究《通识教育改革》中所指出的。^[21] 美国已经实现了从精英高等教育走向了大众高等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经从全部年轻人的 1/6 上升到 1/3。而且这 1/3 的人口在社会等级、民族背景和学术旨趣等方面越来越显示出差异性。每年只有很少的学生上全日制的四年制学校。社区学院的兴起意味着每年有更多的学生接受自由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的一般模式，

即以接受普通教育和历史为开端，然后毫不费力地转到专业化和现代化的学习。学生一开始是作为学技术或园艺的学生，然后进入科学、历史和社会学，或进入植物遗传学、艺术史和文学。

另外，由于大量的学生涌向研究生院或专业学院，而且数量庞大的大学校友现在终身都在进修课程。所以，四年本科生活期间接受自由教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也就不复存在了。再则，知识在急剧增加，人们对于自身以外的文化的兴趣大大增强。而且还有一个怪现象，像数学、理论物理、音乐和舞蹈等都是年轻人的游戏。（还没有哪一项数学上的重要发现是 35 岁以上的人所作出的。）所以，有的学科的学生应当允许早一点进入专业学习。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从 1945～1974 年，由于工业竞争对手——英国、日本、德国、中国、法国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由于石油能源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和便宜，美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美国主宰世界经济的结果是使更多的年轻人为了工作去接受教育，就像关注音乐、旅行以及革命文学那样去关注生产性职业，而不是贪玩。当四年大学教育要花费 5 万美元或更多，就像今天多数最好的学院和大学的花费一样，这时候，一个年轻人想得更多的是可能获得更丰厚的经济回报，而不是“敬而远之”。

另外，成人大学生人数的剧增使得越来越多的课程要在周末或夜间开课，或由短期教育机构提供。而且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从学校以外的各种新渠道和通过自身认清事物的意义，拓宽知识面，获得全面的发展。这些渠道包括：看杂志，我们这个时代的出版物是十分丰富的；参观博物馆，去新墨西哥或希腊旅行；访问收容所，或者特别设计的经历；看电影，阅读档案文献，听磁带等等。

因此，回归传统的自由人文课程的想法，就如同要求社会恢复到没有疏远隔阂的小乡村的愿望，只能是一种空想。现代大学已